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 角色與作為*

鍾延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高饒事件」是中共建政後黨內高層發生的第一起政治清洗。鄧小平親身經歷此事件，晚年更以證人的身分對之評論並簡略說明他個人在其中的角色與作用。鄧的相關講話經刻意刪改後，收入《鄧小平文選》，成為中共官方迄今為止對「高饒事件」的標準說法。針對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的問題，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只能千篇一律地轉述《鄧小平文選》中的有關內容；西方的研究雖無須鸚鵡學語，但囿於資料的限制也無得深入。本文利用近年陸續出版與面世的資料與文獻，再輔以訪談，試以對鄧小平對「高饒事件」的具體介入情形與實質發揮作用，作一細節的實證研究。本文認為：高崗上調中央工作後即為毛澤東所特別器重，鄧小平對此過程知之甚詳，對高自也不敢小覷。毛澤東為推行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張，也有意讓高崗、饒漱石作為開路的鋒將，針對黨內思想較為滯後的領導人如劉少奇等施加壓力；然而，每當相關政治施壓流於過度而使問題失焦之時，毛皆要鄧小平協助將之導正，鄧在此過程中也形成並確認毛重視維繫黨內高層團結的認知。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得志一時的高崗，其行徑張揚而有失謹慎，甚至出現明顯的偏差，如此已讓毛澤東感到忌憚，高崗有違紀律地遊說鄧小平以改變劉少奇地位的舉動，更成為鄧向毛告發高行為不法的口實，以及毛必須對高崗錯誤予以明快處置的重要原因。在毛澤東將高、饒問題加以定性且認定有罪後，鄧小平的任務就是在程序上展開並完成對兩人罪行的調查與認證。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因準確判讀毛澤東的心思與需要，其權力地位大為躍升；鄧迥異於高崗而表現得執中不

* 作者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莫納許大學 (Monash University) 的孫萬國 (Warren Sun) 教授曾對本文初稿的惠予指導與評論。另外，作者也感謝兩位評審人對本文的改進所提供的重要建議與寶貴意見。本文如有任何問題，則概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98年7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99年3月10日

偏，也博得多方的肯定。

本文的討論，除對中共相關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也有助於增進對鄧小平若干政治人格特質的瞭解，例如：能機敏掌握上者心意與動向，並機警調整態度以對；擅於緊抓問題要害，更敢於果斷速決、冒險行動；對於自身的政治對立面，重手處理而不手軟；對於自己深度涉入的政治與歷史爭議，則有自我袒護的傾向。

關鍵字：鄧小平、高饒事件、毛澤東、中共菁英政治、中共黨史

壹、前言

「高饒事件」是中共建政後黨內高層發生的第一起政治清洗，其導致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的自殺身亡與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在政治上的黯然出局。在這起政治事件中，當時擔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也有所與聞，鄧小平晚年亦以親歷者的身分評論此一事件，並說明他個人在其中的角色與作用。

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文獻，在論及鄧小平在「高饒事件」的作為時，千篇一律地將《鄧小平文選》中的相關講話整段收入，也就是用鄧自己的話來回答。鄧小平在《文選》中無論是對整起事件或是其個人角色所作的論斷，業已成為中共官方迄今為止對相關歷史的標準說法。然而，其問題在於：鄧小平針對「高饒事件」的同一講話，有更多的內容已經披露（趙家梁、張曉霽，2008: 99-100, 261-262），其顯示鄧對該事件的真實看法，遠較後來公諸其《文選》中的文字更為複雜。這種僅以當事人（鄧小平還是該事的主要得利者）的口白作為解釋相關政治事件的作法，也是不無問題的；鄧對相關問題的講述也過於簡單，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影響鄧在「高饒事件」中之行止的因素，僅只是他覺得高、饒兩人行為不正常？在高、饒問題被揭露以前，他們為時近半年的集中活動的階段，鄧當時所為何事？問題被揭發後，鄧在對高、饒的相關組織處理上的角色又為何？在其簡要的回顧中都沒有觸及。

中國大陸境外的相關研究文獻，可以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與

黃靖 (Jing Huang) 各自的著作為代表。其論及鄧小平與聞「高饒事件」的問題時，主要圍繞在兩個問題：高崗何時找鄧小平進行政治遊說？鄧是否如其晚年自己所言的立即將高的有關活動向毛澤東報告？泰氏、黃靖兩人皆認為高崗找鄧小平遊說時，鄧因未能確定事態的發展，故以模稜的態度回應高；在高向鄧遊說的一段時間後，在情勢較為明朗下鄧才向毛報告 (Teiwes, 1990: 7, 93-94, 108-109, 111-114; Huang, 2000: 189-193)。海外關於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學者，雖不用對中共官方觀點鸚鵡學語，但囿於相關資料的不透明與稀缺，猜測 (speculations) 與猜想 (guessworks) 乃是相關類型著作的一主要特徵。雖然臆測與推理在從事中共高層政治分析至今仍不可免，但是隨著近年有關資料與文獻陸續出版與面世，像高找鄧遊說與鄧找毛報告的具體時間問題，已可以進一步地加以澄清與解答。在掌握更確切的時間的基礎上，則可對高崗、鄧小平當時各自行事的動機與考量問題，重新作出更貼近實際的推判。

另外，在以泰偉斯相關著作為代表之西方主流敘說中，對於鄧小平與聞該事件的描寫與分析，僅是附屬性質，並非是深入而系統的專論，因而另存有如下的問題：對於鄧在毛澤東 1953 年政治操作中的地位與份量問題，欠缺整體性、突出性的認識，連帶地對於此一過程對鄧形成特定政治認知的作用，強調不夠；關於鄧告發高崗對事態發展之政治影響的探討，宜更加細膩；對於鄧對「高饒問題」組織處理的參與，討論甚少；有關鄧在「高饒事件」中的政治獲益問題，其分析面向也可再加擴展等等。

鄧小平在高崗、饒漱石從事所謂「陰謀活動」的過程中，持以什麼態度與立場？影響鄧小平相關言行的因素為何？鄧小平在「高饒問題」被揭發與組織處理的過程中的角色與作用？鄧在「高饒事件」後的政治獲益與影響為何？經過有計畫的文獻蒐集與訪談，本文在初具條件的情況下，嘗試對前述問題進行解答。

本文論點為：高崗上調中央工作後即為毛澤東所特別器重，鄧小平對此知之甚詳，對高也尤為側目。毛澤東為推行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張，也有意讓高崗、饒漱石作為開路的鋒將，針對黨內思想較為滯後的領導人如劉少奇等施加壓力；然而，每當相關政治施壓流於過度而使問題失焦之時，

毛皆要鄧小平協助將之導正，鄧在此過程中也形成並確認毛重視維繫黨內高層團結的認知。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得志一時的高崗，其行徑張揚而有失謹慎，甚至出現明顯的偏差，如此已讓毛澤東感到忌憚，高崗有違紀律地遊說鄧小平以改變劉少奇地位的舉動，更成為鄧向毛告發高行為不法的口實，以及毛須對高崗錯誤予以明快處置的原因。在毛澤東將「高饒問題」加以定性並認定有罪後，鄧小平的任務就是在程序上展開並完成對高、饒罪行的調查與認證。鄧在「高饒事件」中因執中不偏、舉止得宜，博得各方的肯定，其權力地位也因此大為躍升。

本文之目的在於：對鄧小平對「高饒事件」的具體介入情形與實質發揮作用，作一細節的實證研究 (detailed empirical research)，冀以對鄧小平與中共相關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文內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概有七個部分：一、介紹「高饒事件」發生的背景，尤其是 1953 年初中共的高層情勢與權力態勢；二、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高崗、饒漱石串謀起事主要表現在 1953 年夏的全國財經會議與是年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因此將檢視鄧小平在相關會議期間與前後所採取的作為；三、高崗找鄧小平遊說的問題；四、鄧小平舉發高崗的問題及其影響；五、高、饒被批鬥並移送組織處理後，鄧小平的職責與作用；六、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的得益問題；最後，在結論的部分，將簡單探討鄧晚年為何堅持此案不能重議，以及此歷史議題的討論如何有助增進對鄧政治人格特質的瞭解。

貳、「高饒事件」的背景：「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針對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展在即並相應地有強化中央領導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上調地方上各大區的主要領導人至北京襄助工作。1952 年中至 1953 年初，任職地方的方面大員如：西南的鄧小平、東北的高崗、華東的饒漱石、中南的鄧子恢、西北的習仲勳等上調中樞，此即是所謂的「五馬進京」。鄧小平乃先於高崗「進京趕考」。

1952 年 8 月 7 日，鄧小平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鄧到任後首次拜會總理周恩來時，周還曾賦予厚望地對鄧表示：「主席一定很快就會賞識你的」

(吳群敢, 1997: 100)。然而, 不久之後, 「聖眷正隆」者並非是鄧小平而是高崗。1952年11月, 高崗被任命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由於斯時的國家計委會乃與政務院平級, 易言之, 高的計委主席一職實同於總理級的地位, 其階自是在鄧所任之副總理之上。高崗此一職位地位的突出, 可另見他麾下之計委的組成人員, 其包括: 副主席鄧子恢, 委員陳雲、彭德懷、林彪、鄧小平、薄一波、彭真、習仲勳、黃克誠、劉瀾濤等人。鄧小平還屬於高崗領導的下級。

相較於包括鄧在內的其他調任京官的地方領導人 (後來與高崗一同被歸類為「一丘之貉」的饒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習仲勳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鄧子恢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仕途已如「一馬當先」的高崗, 其政治氣勢持續看漲, 這主要肇因於毛澤東當時對其在黨、政工作上的副手劉少奇與周恩來的不滿, 毛的作法就是「壓周 (恩來)、抑劉 (少奇)、提高 (崗)」。

毛澤東斥責周恩來的政府工作的引爆點, 在於1953年元旦正式實施的「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新稅制政策。1月15日, 毛澤東就此事致信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薄一波, 批評相關政策未經中央討論即匆猝施行。隔日, 鄧小平出席周恩來召集的會議, 研究新稅制實行後的市場物價問題, 並對毛對新稅制問題所作的批評加以討論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 2009: 1002)。

2月19日, 根據毛澤東月前所提的政府工作存在脫離中央掌控之外的分散主義的意見, 周恩來主持召開關於加強政府各部門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和作好分工的座談會, 鄧小平也與會。該會代中央起草的後於3月10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 (草案)》, 對於政府工作的分工安排為: 高崗負責國家計劃工作; 董必武等負責政法工作; 陳雲等負責財經工作; 習仲勳負責文教工作; 身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 僅負責外交工作, 其權限緊縮至如此田地, 可見其處境之尷尬。至於鄧小平, 則負責前述五個領域外的工作, 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值得指出的是, 毛澤東還曾在3月3日特別批示: 「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 (毛澤東, 1990a: 72-73)。5月15日, 政務院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

知》，進一步對其所屬財經部門的領導關係重新加以安排。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高崗一人就領導工業相關的八個部門；相形之下，鄧小平僅受命領導鐵道、交通和郵電部。高崗權傾一時，滿朝文武皆為之側目。

毛澤東除對周恩來的工作有所挑剔進而大為掏空後者的權力外，毛也以公開與不公開的方式對其自延安時期以來的長期助手劉少奇表達不悅甚至提出質疑。1950年代初，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若干具體政策問題如農業互助合作問題、工會工作的方針問題，以至於相關議題背後所涉及的如何看待、定位「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進而擇時向社會主義階段邁步的戰略問題，屢有觀點與意見上的出入。相較之下，高崗在黨內針對前述問題的論爭過程中，每倒是顯得與毛澤東相契合（林蘊暉，2008: 71-86）。

時任東北局第二副書記的張秀山（2007: 321），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更透露：1953年初，毛澤東要高崗親自查看存放在瀋陽的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當地被捕的情況。高就指示張負責執行查看劉的相關檔案。此事十足反映出毛澤東對劉少奇不信任的地步，甚至已到懷疑其政治品質是否忠良的嚴重程度。毛暗中交代高崗調查地位在他之上的劉少奇，確實讓高崗直接地解讀為是毛對之特別信任的一種表現。持平地說，高崗後來會浮想連翩甚而走火入魔，不能僅單方面歸罪是其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由於毛要高密查劉被捕紀錄的爆炸性舉動，在當時僅有極少數人知道，鄧小平對此恐不知情。但鄧可另從毛澤東針對劉少奇所作的公開批評聞曉前者對後者的不甚滿意。

5月20日，毛澤東寫信命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查未經其審閱即冠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並直截指出：「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毛澤東，1977a: 80）。由於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劉少奇所負責，毛此一批評顯然是針對劉而來。在毛澤東的盛怒之下，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會同劉少奇、鄧小平、饒漱石、楊尚昆等人起草關於中央辦公制度和文電處理的改善辦法，提交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 303）。

正是因為親身經歷1953年春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以及與此同時在毛扶植下高崗權力的急遽擴增，年屆八旬的鄧小平回顧1953年上半年政局時就表示：「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

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趙家梁、張曉霽，2008: 261）

參、全國財經會議前後的鄧小平與高饒案

195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與會者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大區、省市和財委的負責人（各大區、省市的財委主任都由第一書記兼任）。根據該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全國財經會議如何進行的請示報告》，該會議指定鄧小平與周恩來、高崗爲總的經常主持人。

全國財經會議開始後的近一個月的時間內，會議的發展並未按照原先設定的討論主題與議程進行，因爲爲數不少的與會者將意見集中在對新稅制及其主事者薄一波的批評上。身爲會議經常主持人之一的鄧小平，在會議相關情勢進一步激化發展以前，則因身體健康出現問題而暫時退出會議。7月5日，周恩來和朱德前往醫院看望病中的鄧小平。周、朱以其在黨內的資深地位，竟主動探訪鄧小平，甚可能是出自毛澤東的意思。周恩來在探視後也隨即致函給毛說明鄧的情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 312）。

在鄧小平治病休養期間，全國財經會議有新的發展。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會議中出現的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的情況。毛澤東指示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7月13日至25日，根據毛澤東11日的指示精神，周恩來主持9次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13日，薄一波作關於財政、金融、貿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查。14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中共官方歷史向來只強調高崗、饒漱石此時對薄一波進行居心叵測的批判，亦即批薄的同時，也間接指向與薄淵源與工作密切的劉少奇。事實上，既然毛澤東在批薄問題上開了綠燈，會場上踴躍地對薄個人所提出的指正，就不可能是「和風細雨」（薄一波，1997: 257, 259-260），而如高、饒指桑（薄）罵槐（劉）者也大有人在，例如：與高曾共事於東北、現於中南任職的陶鑄（曾志，1999: 452）。

毛澤東指示薄一波在會上進行檢討，除了他確實對薄工作有所不滿，其

也希望藉由批判薄的所謂資產階級思想（也不能排除有順帶敲打劉少奇，促之跟上自己的用意），讓黨內高級幹部在思想上盡快跟進其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所首次完整表述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想。然而，毛構想的思想揚棄與轉換的目標，卻因會議形成一面倒批薄個人錯誤的局面而落空，其他的具體工作事項也無法討論，會場內外甚至也出現一些與工作無關的出格議論。

爲了將會議撥回預想的軌道，根據楊尙昆回憶：「毛主席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交代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裡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楊尙昆，2001: 291）由於會議的僵持不下，主要在於包括高崗在內的不少人對於薄一波所犯錯誤的揪住不放，毛澤東要楊尙昆找陳雲、鄧小平前來與會，雖希望藉此聆聽他們可能的想法與意見，但是要他們當援兵此一動作本身，其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就是要暫緩會中的主要政治爭議；另外，7月24日，毛澤東透過周恩來向會議傳達「不能把華北的幾個同志說成宗派」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 170），意在對批薄所衍生的人事議論加以煞車。諸此種種，鄧小平不會不能掌握毛澤東的有關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後高崗試圖爭取陳雲加入批判薄一波的行列。7月20日左右，高崗在會議休會期間和一些人去北戴河看望陳雲，向陳訴說會議的情況並希望他就此發言，但沒有爲陳所接受（張明遠，2004: 382）。高崗有否向同在該地休養的鄧小平就此交換意見，則尚不得而知。

7月23日，陳雲回到北京；鄧小平則到8月3日方返抵北京。8月6日，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在陳雲發言爲薄一波說話後，鄧小平接繼發言。鄧對會議的熱點問題—批判薄一波，也有所表態，其持以的立場是：贊同批判薄一波，但不要過度上綱上線：

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

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薄一波，1997: 251）。

或自認掌握到毛澤東對會議的最新意向，在如何對待薄一波錯誤的問題上，鄧小平表現得頗有信心。鄧小平在發言後還對其他人表示：「現在大家不是對一波有很多意見嗎？可是我發言還是支持了他的。做工作嘛！誰能不得罪幾個人。」（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第十二兵團（編），1967: 7）因為鄧小平、陳雲對薄一波相關問題的直言與緩頰，會議氣氛出現緩解，毛澤東對會議「搬兵」之計產生了效果。相形之下，高崗卻未能見好就收以配合毛對會議氣氛要稍作轉圜的期待，在8月9日討論周恩來預定提交會議之結論講話稿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執意繼續責難薄一波而反遭毛所喝止（薄一波，1997: 251-252）。

頗令人玩味的是，隔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上，高崗經毛澤東事先審閱修改過的發言內容中，仍還有一篇幅不短的「批薄（一波）射劉（少奇）」的內容（林蘊暉，2008: 102-103）。8月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其內容中也側重於對薄一波工作的批評，並將之看作是有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亦即是「離開黨的總路線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毛澤東，1977b: 90-94）。可見全國財經會議批薄一波以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進而興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之戲碼，其之張弛節度皆控掌在毛澤東的手裏。

8月13日，為時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終於落幕。會議期間成為眾矢之的的薄一波身心俱疲、掛冠求去，被毛澤東當作調節會議旋律使用的鄧小平成為補替薄所遺空缺之人。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免除薄一波財政部部長職務，由鄧小平兼任中財委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

為了消弭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黨內高級幹部之間產生的對立與裂痕，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後一改其先前在幕後放火的角色，分別約見各大區參加會議的主要代表，從不同的面向呼籲大家團結一致。例如：毛對於代表東北地區的高崗與張明遠，就指稱是譚震林所言的「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的說法（一為掌握黨權、政權和財權的「白區黨」，另一是大權旁落的以毛為首的「蘇區黨」）是錯誤的，強調「只有一個共產黨，一個司令部，就是黨中央」（林蘊暉，2008: 121-122）；對於代表中南地區的陶鑄、李雪峰，以及李先念，毛回顧中共發

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山頭主義與幹部背景差異的問題後，特意指出「現在不是搞根據地的時候」，「要搞好團結，搞五湖四海」。李雪峰在抗日期間與鄧小平共事於太行山，鄧對於李的工作表現與能力皆甚為欣賞，彼此熟識也形成特殊的信任感。李雪峰在毛相關談話後不久，即向鄧小平轉述毛的主要論點。鄧小平聞後表示：「這是主席親自做團結的工作。」（李雪峰，1998: 218-219）

全國財經會議後期，毛澤東點將鄧小平、陳雲與會以扭轉會議糾結在批判薄一波的氛圍，這已讓鄧小平感受到毛澤東在會議後期求黨內團結的意旨。經李雪峰在會後轉述前述毛的相關談話內容，鄧更是會將力求黨內團結，視作既符合毛所願、對黨也有利之事。毛澤東爲了讓全黨接受其個人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構想，他要高崗作爲衝擊既有權力態勢、加壓黨內高層（特別是薄一波背後的劉少奇）的角色，亦即讓高崗扮演「團結中不忘鬥爭」的黑臉角色。相對地，毛澤東則要鄧小平作爲緩和黨內衝撞、驅動全黨齊一步伐的角色，也就是讓鄧扮演「鬥爭中更求團結」的白臉角色。在毛澤東的佈置以及鄧小平對此的領會（當然或有不乏鄧個人對此的認同），鄧小平在中共領導層情勢時而緊繃的 1953 年，主動或被動地高舉黨內要團結的旗幟。這讓鄧小平在後續詭譎的情勢發展中得以佔有較具正當性的位置。

高崗後來被揭發在全國財經會議前後大肆活動，另立「司令部」、網羅人馬。雖然高崗尚不至恣意妄行到如此地步，然而，1953 年 7 月、8 月，其確實在群聚高幹的北京飯店異常活躍出沒（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2002: 78）。對此，鄧小平也應至少能略知一二。但是以薄一波被革去財政部部長一職後提出離開中央到下級單位工作的請求時，鄧小平與其他領導人皆不敢多置一詞，而要薄「直接去同毛主席談」（薄一波，1997: 257）；對於斯時在毛澤東跟前頗爲得志的高崗，鄧小平恐更不敢小覷，遑論在毛面前言高之不是。

鄧小平當時親歷的一個高崗受到毛澤東特別對待之事例可見於：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後不久，針對是年財政已出現不小額度的赤字的情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高崗在會上介紹東北過去爲因應財政困難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經驗與成果，毛澤東對此表示稱許，主張下次會議專論此一問題，並主張會議就在高崗住處舉行。數日後，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饒

漱石等中共要員皆前去開會（此會乃為解決具體問題的會議，毛並無出席）。會後，李富春代中央起草《關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指示》，作為中央指導進行增產節約運動的正式文件（8月28日發出）。

這種在毛澤東以外的領導人的寓所召開中央會議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導全國工作的作法，並無先例。此外，相關的財政問題，本來即屬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雲、以及新任財政部部長的鄧小平的管轄事務範圍，但是毛澤東卻示意由高崗主持解決（趙家梁、張曉霽，2008: 142-143）。高崗當時所受的毛澤東分外的青睞，鄧小平不會不能有所感應。鄧在1980年回顧時也說高崗「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趙家梁、張曉霽，2008: 261-262）。

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的鄧小平與高饒案

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後，接任財政部部長的鄧小平開始進行1954年國家預算的編制工作。由於1954年財政預算規劃問題，事屬跨部會事項，因此須提交高崗所領導的國家計委研議，這是1953年入秋以後鄧小平與高崗在工作上的重要交集。10月3日到11月2日，高崗離開北京休假，先後停留南京、上海、杭州、廣州。此乃中共官方向來指稱的高崗「以休假為名，南下華東、中南進行遊說」之旅。高崗回京後，鄧小平11月中旬還曾請李富春向高崗轉達其對1954年預算安排問題的意見（趙家梁、張曉霽，2008: 90）。綜前所述，鄧小平與高崗之間在此階段的往來，除了工作外並無異樣。

9月16日，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195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將此會議與先前的全國財經會議評價為「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暴露的場域（鄧小平，1985: 515）。鄧小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初始階段，因其不是以劉少奇為首的會議領導小組的成員，所以對會議似無特別的與聞。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在10月上、中旬主要忙於協助陳雲，研議糧食問題、籌建統購統銷制度。好不容易統購統銷政策事情忙到一段落，鄧小平又被捲入陷入膠著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

對於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開法，毛澤東自有定見。毛希望此一會議回顧並檢查中央組織部先前的工作，在總結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讓負責各級組織業務的幹部統一思想，進而為其推動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群策群力，亦即從組織上為路線的實行作保證。然而，因為組織工作在中共中央向為劉少奇分管、安子文承辦，毛澤東主張會議對中組部工作進行檢討，可能也有對劉少奇「敲山震虎」的心思，期以讓劉更戰戰兢兢地尾隨毛的新戰略與政策。從這點來看，毛澤東對全國財經會議與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思想與做法是有其一貫性的。

如果說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熟於「批薄射劉」，是自認對毛「探了消息」；饒漱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專於批判安子文、甚而「討安伐劉」，也甚可能是其自以為對毛心意的揣測。饒漱石從 1953 年 4 月就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因副部長安子文確犯有明顯的政治錯誤（未經授權即草擬中共中央政治局未來可能的新組成名單），也或是饒「新官上任三把火」，想藉由對安展開批判而「立威」，中組部正副首長饒、安之間因而一直緊張、不和。主管黨務的劉少奇想將此事化大為小，既請人找饒漱石相談，自己也會利用其早年在華東作為饒上級的關係，親自找饒講話，但饒皆不領情。檢查先前組織業務工作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召開，饒漱石更覺得師出有名，再掀對安子文的鬥爭。

饒漱石對安子文與中組部（連帶地對劉少奇）先前工作缺失的直書不諱，開始是有利於毛澤東達致其對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要勇於總結過去經驗的想法；然而，饒漱石操之過急，不知適可而止，一味地戀棧在對安子文個人問題的糾鬥上，影響到會議的整個進展卻不自知。根據時任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一員的楊尚昆回憶：在一次針對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問題的中央書記處匯報會上，饒漱石甚至還抱怨：「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對於饒這種欲將事端再行擴大的態度，毛澤東開始失去耐性。

鄧小平原對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無甚涉入，但是毛澤東卻要其出馬，詢問饒漱石其以為誰應前來與會，「開個名單通過去請來」。饒漱石僅向鄧小平提出陳賡，饒或希望言無禁忌的陳賡可以對會議火上加油（楊尚昆，2001: 296）。陳賡在戰爭時期即對鄧小平特為敬畏。雖然無從得知鄧小平是否事先有對陳

賡介紹會議停滯不前的情況，或是對他做工作要其在會上謹言慎行，但陳賡在發言時確實沒有助長會議的火勢。

在全國財經會議被毛澤東當作「預備隊」的鄧小平，這次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則被毛當作針對饒漱石的「偵察隊」，鄧小平應能感受到毛澤東對饒漱石在會議中一意批鬥安子文而使得會議停擺的做法有所不悅。或清楚瞭解到毛澤東不要會議只顧糾纏在評價過去以及相關主事者的新意向，鄧小平在最後一次會議小組會上表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是貫徹了中央的路線的。鄧著重指出：「這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陳野蘋、韓勁草，1985: 104）10月27日，鄧小平在會議閉幕會上也做了一個旨在強調團結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9: 1133-1134）。

1953年在政治上居於劣勢的劉少奇，面對毛澤東對其的不滿，以及在此背景下高崗先前在全國財經會議、饒漱石此次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對他直接或間接的挑釁與挑戰，放低姿態守勢以對，忍氣吞聲苦撐待變，在會中作了自我批評、承擔責任。劉少奇的以退為進，事實上，反教欲為難他的人失去著力點。既然劉少奇坦然扛責，再加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其他領導人的驅策下，饒漱石對他到任前中組部工作的評價，最終也不得不改持肯定的態度。為時超過四十天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終得落幕。

1953年秋冬之交，基於如下三個原因，毛澤東逐漸開始對高崗有所提防，甚至認為其與饒漱石兩人之間有所密謀：

一、由毛澤東看來，高崗與在軍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彭德懷、林彪過從甚密，觸動了毛一向堅持的「槍桿子」唯其所能掌控的敏感神經。

高崗與彭德懷因為一同費心為朝鮮戰事籌劃，所以形成密切的工作聯繫與個人之間的瞭解。這從多疑的毛澤東看來，並非沒有任何的政治含義。1952年7月，周恩來提議彭德懷以軍委副主席的身分兼任總參謀長。彭德懷認為工作繁重難以勝任而不願接受。彭專門為此找毛澤東談話，列舉高崗的優點並推薦高擔任此職。毛沒有同意，反問彭：「高崗就難道沒有缺點嗎？」彭德懷繼而推薦鄧小平。毛澤東肯定鄧的才能，也認為鄧與軍隊有較多的聯繫因而是一合適的人選，只是鄧從現在的崗位上抽不出來（《彭德懷傳》編寫組

(編)，2006: 291-292)。此事或讓毛澤東留有彭德懷、高崗「關係匪淺」的印象；此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毛澤東在高崗與鄧小平兩人之間做評比與擇取時的可能態度。

毛澤東對高、彭走得太近的疑慮，到後來只增不減。1953年8月，韓戰以平手結束，彭德懷以戰爭英雄之姿凱旋歸國。此時的彭德懷因軍功顯赫，威望甚高，毛澤東對他的動向自不會等閒視之。9月，彭德懷到毛澤東處講他對劉少奇、周恩來在個別問題上的意見，毛要彭去同劉、周相談（王焰（主編），1998: 560）。毛澤東可能會想：彭德懷主動找他提對劉、周的意見，其是否受到對劉、周頗有看法的高崗的影響？彭、高之間是否形成特殊的關係？從後來的發展觀之，毛澤東對此就是一直抱以狐疑的看法。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就指控彭德懷參與了高崗的反黨活動，甚至是「彭高聯盟」。

林彪在紅軍時期就是一著名的虎將，他在國共內戰期間領兵打勝遼瀋與平津兩場會戰，統兵從東北一路南下直抵海南，所向披靡、銳不可當，其軍事上的勳績與建樹，享譽全軍，是中共軍中另一指標性的將領。高崗與林彪自東北共事起就有不錯的關係，毛澤東自是知曉。然而，毛多少會擔心：高崗在處心經營其與林彪的關係時，會不會超過毛可容忍的界線，也就是背著毛在政治上與林私相授受？林彪是毛澤東自江西井岡山時期即帶起的真傳嫡系，毛認為林彪只能效忠於己。高崗若真私自與林彪連成一氣，侵蝕、動搖了林對毛一人的忠誠，毛自不會坐視不管。

綜前所指，彭德懷與林彪乃中共解放軍中的兩大「龍頭」，高崗與此二員有密切的關係，還隱含一政治意義：高可能已與軍方有非比尋常的聯繫。這對於絕不容他人染指軍權的毛澤東而言，高崗易被看作是一潛在的不穩定的因子。

二、高崗的若干行爲，因有觸發政治不穩、甚至拖毛澤東本人下水的風險，而爲毛所不快與猜疑。

1953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接見因要參加行將於12月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而提前來北京的葉劍英與譚政時，後者居然問起毛有關安子文草擬中央政治局名單一事，這讓毛既詫異又光火。關於此一問題，肇事者安子文已遭嚴重警告懲處，相關情事也勒令不得再討論與外傳，何以

遠在中南任職的葉、譚兩人在事過數月後仍會有所聞知。這是否與高崗不久前的南方休假有關？因為高崗停留粵、湘的三天期間，就是葉劍英陪同參訪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2007: 806）。毛不禁會再猜想：高崗在南遊期間又跟誰見了面、談些什麼話？高崗此行恐不那麼單純地僅是休憩而是另有目的。

與此相關地，高崗口風如此不緊，他是否也會輕率地將毛澤東過去跟他所說的「私房話」，特別是關乎高層人事問題的議論，向他人脫口而出？若是如此，情況會變得頗為棘手：一方面，毛擔心高崗的多嘴會洩漏自己曾對其他政治人物所做的臧否，這樣會有損其公允、無私的政治形象，甚至暴露出自己性好玩弄權術、挑撥離間的一面。事實上，毛的擔憂早已成爲事實，高崗確實常將毛的有關談話與其自認的「哥兒們」分享，甚至一同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毛或也顧慮到一種可能：高崗會以毛爲名到處遊走、招搖以遂行私我之目的。

三、毛澤東懷疑高崗與饒漱石之間，在政治上有不可告人之處。

高崗與饒漱石在 1953 年諸次重要政治集會中的立場與態度，表現得近乎一致。例如：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高、饒批薄一波皆不手軟。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高崗本人並無與會，代表東北出席的張秀山對安子文工作的批評內容，毛也事先聽取張報告，對張的意見表示支持，並鼓勵其到會發言（張秀山，2007: 299-309, 314）。然而，饒漱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後期被批評，高崗爲何在毛面前爲之緩頰？毛乃回頭懷疑，張秀山是高崗安排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配合饒漱石的政治「打手」（毛澤東，1977c: 146；鄧小平，1985: 515）。另外，毛澤東在追究何人繼續散播安子文所擬之中央政治局名單時，本已心虛不已的高崗不但不誠實以對，竟又爲饒漱石澄清（趙家梁、張曉霽，2008: 179）。綜上種種，毛懷疑高、饒之間恐已形成類似戰略協作的關係。

因此，毛澤東需要進一步地觀望情勢的發展並觀察高崗爲主的眾人的表現：冒失的高崗會走得多遠？高崗與其亟欲扳倒的劉少奇在經過此前數月的較量後，各自在黨內的人望爲何？另外，其他領導人會有何表現，是否會對毛忠心耿耿？還是會趁著權力可能重新分配之機而謀求私利？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在 12 月 15 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拋出一議題：在

其年底請假赴杭州研究制定憲法事宜期間，是要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或是由其他書記處成員輪流主持？與會者爲此議題出現意見不一、各持己見的情況。劉少奇或因自感有錯在身、先前也屢爲此檢討而自覺不適，故表示輪流主持。朱德、高崗、饒漱石也都主張輪流。但是鄧小平和周恩來、陳雲、彭德懷一樣，咸認爲還是由劉少奇主持爲宜。由於對立的意見呈現五五波的局面，毛澤東裁示下次再議。

中共高層政局卻在此次中央書記處會議後發生重大的變化，「高饒問題」不久就被正式置於檯面。

伍、高崗對鄧小平進行遊說

一、高崗遊說鄧小平的時間與場合

對於高崗何時去找鄧小平遊說的問題，鄧晚年只有籠統地表示在 1953 年底。對此，學界向來是眾說紛紜、臆測不斷。然而，根據近年來中共官方出版的文獻，現在已有條件提出準確的判斷。其時間正是討論毛澤東休假期間由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12 月 15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會後。因爲《陳雲年譜》與《鄧小平年譜》皆明載：在 15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會後，高崗又分別找陳雲、鄧小平，動員他們也贊成輪流主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 191；2009: 1150）

其次、高崗找鄧小平遊說時兩人的互動情節與場景問題。根據鄧小平自己的說法是：

對西南，他（高崗）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鄧小平，1983: 257）。

鄧小平特別指出高崗是「正式」找之「談判」，但是鄧卻沒有交代高找之遊說的具體場合。

另外，傳播上頗為流行的楊尙昆（2001: 293）的說法則是：

在鄧面前，他（高崗）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史達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小平同志看穿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牆上掛的幾張中央書記處（書記）像說，就在這中間嘛！並向高指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輕易更動。

楊尙昆的說法較鄧小平的說法還為生動，而且據其所言，高、鄧是在室內交談，但具體的場所仍不明，而且楊畢竟不在現場。

時任高崗秘書的趙家梁，以其親身的見聞，較詳實地提供高崗向鄧小平遊說時的場景細節（趙家梁、張曉霽，2008: 184）：

（12月1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散會後，大家從會議室出來，三三兩兩地一邊向停車處走，一邊繼續議論。高崗走在鄧小平身邊，說：「少奇政治上不穩，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還是輪流好。」他還提到，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鄧小平反駁道：「少奇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

趙的說法，無論在時間或場合問題，皆能提供前述的《陳雲年譜》、《鄧小平年譜》相關內容所無的具體細節；另外，據其所指，高崗找鄧小平議論劉少奇乃是接續著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是否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具體議題而發，如此顯示高崗並非是沒有事由、未經熟慮即唐突地對鄧小平提出劉少奇的地位問題。

二、高崗遊說鄧小平的原因

在中共馬上爭天下的過程中，鄧小平統兵一方、崢嶸沙場的經歷，高崗不僅知悉，甚至曾向蘇聯人介紹過（趙家梁、張曉霽，2008: 56）。按照高崗在1953年所推銷的「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權力分配標準，鄧小平可有資格享

有一杯羹。此外，鄧小平在中共建政初期坐鎮西南地區，即便鄧上調中央，但他對西南的黨政要事、人事調動，以及地方建設問題，皆仍享有重要的發言權。高崗也確實必須考量作為西南主要代表人物的鄧小平的實力與動向。事實上，鄧小平晚年即指稱高崗找他遊說就因其代表西南。然而，高崗對鄧小平卻一直遲遲按兵不動。

高崗找鄧小平進行政治遊說的 1953 年 12 月中旬，其時間晚於他與其他領導人如林彪、彭德懷試通聲息並且自認初有斬獲以後的事（饒漱石對高崗倒劉少奇意圖的「共襄盛舉」，饒後來堅稱是「不謀而合」）。其主要原因在於：高崗與鄧小平在歷史上雖偶有接觸，但未曾有過朝夕相處的共事關係，兩人彼此的互動與認識皆很少，可說幾無淵源。由於高崗所欲談的問題乃是事涉敏感的權力分配問題，高崗若輕率地跟鄧小平提出有關問題，是要冒有不低的風險。事實上，高崗在進行政治接觸與試探的過程中，乃是有所選擇的。例如：高崗後來就自承不敢在羅榮桓面前亂說（王力，2001: 317）。

另外，在高崗、饒漱石於全國財經會議與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積極活動的過程中，如果說高崗等是針對劉少奇及其相關人士「放火」起事，鄧小平的相關作為，反倒每是為高崗「項莊舞劍」意在的對象，起到「滅火」、解圍的作用。1953 年 12 月 15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也明確支持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諸此種種，高崗皆是清楚地看在眼裡的。

這裡出現的另一問題是，若高崗與鄧小平並未熟稔到「掏心」的程度，鄧小平在高崗等人倒劉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不傾向支持的政治意向，又已是甚為明顯的情況下，高崗為何還要明知難為而仍為之地在 12 月 15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後試圖勸說鄧小平加入其倒劉的行列？

這首先即與鄧小平當時在政治上益受毛澤東器重、愈形走紅的聲勢有關。因為在高崗積極活動、意圖推動高層權力重組的期間，鄧小平益受毛澤東重用的趨勢，已是人所皆知。鄧小平一時「炙手可熱」，成為包括高崗在內的各方力量都極力爭取的對象。

鄧小平上調北京後，其的確不如高崗「一馬當先」的鋒頭強健。然而，毛澤東開始委任鄧更大的權力，並非始於「高饒問題」浮現之後，相反地，在高崗活動開始變得更加積極之前，已有跡象顯示毛有意讓鄧小平擔負更大

的權責。1953年夏，在高崗著墨甚深的全國財經會議中，成爲會議標靶的薄一波無法繼續視事後，鄧小平接掌薄的財政部部長之位。斯時作爲政治焦點的財政部的新人事任命，自非經毛澤東認可不可，亦即鄧小平膺任此職是在毛的同意之下。入秋以後，毛澤東要鄧小平在糧食統購統銷的相關工作上擔負更多責任，也可顯示鄧在毛政治部署上地位的不斷上升。對權力動向極爲關注的高崗，自能觀察到鄧小平成爲毛澤東安排下政治紅人的上漲趨勢。

扳倒劉少奇與周恩來若是高崗的首要目標，「聚焦打擊點、擴大團結面」是符合理性計算下的作法，特別是若能爭取到毛澤東愈加信任的鄧小平的認可，可反過來引導影響毛澤東對權力新作安排的構想，更加促成毛將劉少奇「換馬」之可能性的實現。就高崗而言，劉、周失勢若是一可期的結果，他還是得面對權力地位後勢看俏的鄧小平。12月1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有關是否要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討論一實同如何看待劉少奇作爲「二把手」地位的問題，高崗、鄧小平兩人意見相左。若任由情勢發展演變成高與鄧之間的強烈碰撞，將爲兩人未來的互動與關係埋下不睦的種子。

與此相關地，另一重要跡象也讓高崗不得不防。劉少奇、周恩來在面對高崗對他們公開的接連進擊與幕後的遊說策動，也不會不思作爲而僅坐以待斃。進一步地取得受毛澤東喜愛的鄧小平的認同與奧援，是對高崗的一重要反制作法。例如：1953年9月，周恩來表示：「小平年富力強，手頭又快，要讓他多幹一些。」（孫岳，1998: 169）周此時的感想，恐不僅是反映鄧小平愈益受毛澤東重用的現實，而是欲在此時拉攏鄧小平，使之在政治上面對高崗進逼時增加一份力量。1953年10月27日，劉少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結束時表示：「鄧小平同志講了，全黨過去是團結的，今天也是團結的，那麼是不是高枕無憂了，就看不到缺點了，或者看到有些缺點而把它掩蓋起來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們的缺點，要做工作，要爲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8: 749-750）從全國財經會議以來，鄧小平一直以求黨內團結作號召、並在行動上如是表現，這對於欲維持權力現狀的劉少奇是有益的。劉在講話中引用在黨內地位較其資淺的鄧小平的話，一方面是體認到鄧日益崛起的地位；另一方面，或也是藉此呼應鄧當時的政治傾向，並對之示以友好。

鑑於此，高崗有可能想「化被動為主動」：與其任憑劉、周施力以使鄧小平更緊密地與他們站在一道，不如自己姑且一試，以坦率交換對劉權力地位的看法的方式，直接對鄧小平示好。此番對鄧如「策反」順利，無異是成功地對劉、周「挖牆腳」，讓後者在中央更形孤立，更難以繼續立足。

綜上所述，或是高崗甘冒風險決定拉攏鄧小平、讓之加入其預想的政治新聯盟的主要因素。只不過出乎高崗意料之外，後來事實證明，高崗此番邀請鄧小平一同倒劉的交心之舉，正是導致其政治崩盤的「死亡談判」。

陸、鄧小平對高崗的揭發

一、鄧小平揭發高崗的時間與方式

鄧小平何時向毛澤東揭發高崗的問題，目前也可作更準確的判斷。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寫道：「12月中旬」，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了高崗的陰謀活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3: 279）鄧小平在事發 28 年後表示：他在高崗找他談判後，「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若前述的 12 月 15 日高崗遊說鄧小平的時間是確實無誤的話，鄧小平報告毛澤東的時間範圍，最早應是從 15 日當天起，最遲則應是在 17 日。因為《陳雲年譜》記載：12 月 17 日，「下午 5 點，（陳雲）同鄧小平前往毛澤東住所談話。至晚 8 點，毛澤東請周恩來前來一起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 191）根據《毛澤東傳》的說法，有關談話即事關高、饒問題。鄧小平的官方年譜則透露一線索：鄧曾於「12 月 16 日下午，在毛澤東處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9: 1150）。鄧具體所為何事，相關年譜雖無交代，但甚有可能就是鄧向毛報告高崗的問題。

進一步的問題是：鄧小平在面告毛澤東以前有否先跟其他領導人通氣或一致行動？根據學者所做的訪談，鄧小平乃獨自向毛澤東揭發高崗（Teiwes, 1990: 111）。¹然而，2009 年公布的楊尚昆在 1986 年 8 月 30 日有關中共黨史問題的談話中表示：高崗找鄧小平政治遊說後，「小平就報告了周總理，周總

1 作者自身的訪談所得，也是鄧小平逕自向毛澤東報告高崗的問題。

理就跟毛主席說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厲害。」（張培森（整理），2009: 35）

此說如無訛誤，首先、可表示鄧小平在決定向黨中央告發高崗前，選擇先知會周恩來，甚至與周就此先行磋商；周如願意代鄧向毛轉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周對鄧揭發高崗的支持。如此相較於只有鄧單方面地面陳毛澤東還來得保險。其次、鄧小平將高崗問題先告知周恩來，顯示鄧對周的信任非同一般，這既可追溯到兩人從青少年起即長期共事的經歷，或也是前述的周在高崗屢屢進逼時特地釋出善意「要讓他（鄧）多幹一些」之策奏效。再次、除周恩來外，鄧小平不向其他人特別是劉少奇通報，最主要的顧慮無非是高乃衝著劉少奇而來，鄧若在告訴黨中央之前，即先跟劉告知高在其面前所展露的去劉的企圖，實等同於鄧在進行一援劉反高的政治串連，也就是在劉、高兩人之間的糾葛中選邊。這將自損鄧向黨中央告發高崗的正當性，因此有所不宜。

二、鄧小平揭發高崗的考量

高崗在 12 月 15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結束後，私下再跟鄧小平提出劉少奇是否適合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的問題，鄧小平何以「覺得問題嚴重」並決定予以告發？

第一、鄧小平認為高崗急欲對劉少奇去之而後快，其心可議。

劉少奇在 1953 年面對毛澤東的批評之時，不但頻頻在重要會議上公開進行自我檢討，希望藉此重新取信於毛，也登門向對之有意見者解釋。在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多數中共領導人眼中，劉少奇這種對自身過去在政治上的錯誤坦承不諱的作法，可讓人感到其頗有大度、有心改正。高崗何以仍對他緊追不捨？

劉少奇身為毛澤東副手已行之有年，按照往例，毛有事時即是劉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此次毛在 1953 年底要請假，如果向由劉代理的安排有所變動，不免會引起內外譁然。更重要的是，不讓劉代理毛職的此例一開，形同預示毛以下之既有的相對權力分配態勢將重新洗牌。高崗在幕後奔走、說項以鬆動劉少奇的地位，被高遊說不要讓劉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恐怕會想：

高崗僅是單純地為毛澤東「清君側」？鄧小平若再將此聯繫到自己所曾聽聞的他人（例如：閻紅彥）對高崗歷史與人品的指控（李原，2003: 14-23），高崗或許還懷有更大的「雄心壯志」——設想在毛在中央分一線、二線時，由他自己遞補劉在一線的位置。1980年2月26日，鄧小平回顧相關歷史時就表示：「毛主席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裡就在考慮一線、二線問題。高崗就是在這件事上出了問題，他要搶這個一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 603-604）

第二、自鄧小平看來，高崗對他的相關政治舉動，其中有無違反黨內組織紀律之處，按嚴格的標準，存有細究的空間與嚴辦的藉口；鄧若以此為由糾舉高崗，不失正當也可有不小的說服力。

中共高幹若在非公開的時地議論他人的政策與主張，已非妥當；背後談及上級的是非與進退問題，特別是涉及長期在黨內享有第二號地位的劉少奇，更屬忌諱。鄧小平在12月15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已明確表達支持由劉代理的態度，高崗還不死心地在會後試圖改變他既有挺劉的決定。鄧若同高嚴格計較起來或蓄意與高作梗，亦即稱高是對之進行不法的政治拉攏、從事所謂的「非組織活動」，鄧也不是沒有政治操作成功的利基。鄧後來果然在此問題上刻意著墨而讓高「吃不完兜著走」，狼狽不堪。

第三、從諸多政治跡象來看，鄧小平研判高崗恐已對其他要人進行實質的政治會商並收效頗著；再不制止，就有權力失衡、讓之得手的危險。

高崗膽敢無視黨內紀律找與其交往不深的自己議論、商討劉少奇的地位問題，鄧小平恐難免也會生疑：高崗對同他更熟識的其他高幹如結識於國共內戰時期東北戰場的林彪，相交於甫結束不久的韓戰的彭德懷，是否更會不吐不快、暢所欲言？數月以來，高崗與他們的密切互動與往來，例如：高崗在1953年仲夏大張旗鼓地帶領眾人造訪在北京西山休養的林彪；彭德懷在是年11月底中共中央討論其準備提交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的報告稿時，一再推薦由高崗主持修改，同時到場與會的鄧小平對此勢也看在眼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 189；王焰（主編），1998: 563）。這背後是否存有一些默契與共識？另外，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火力大開，饒漱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砲火猛烈，兩者批判對象所指又是如此相仿。對此，

鄧小平就曾指出高、饒是「這邊一炮，那邊一鬥」（薄一波，1997: 326），亦即認為兩者之間存有暗盤。

顯然，鄧小平認為高崗在 1953 年起事、活動時，林彪、彭德懷、饒漱石皆與之「有染」。因為在鄧小平已是「當家作主」、能自主表達觀點的 1980 年 3 月，他在評論高崗問題時就還表示：「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志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同志。」（趙家梁、張曉霽，2008: 100）因此，在 1953 年底，鄧小平或也會擔憂由高崗牽線的旨在推倒劉少奇之政治陣線已隱然成形、甚而在中央高層內成為形式上的「多數」，並恐對相關權力與人事問題的結果造成影響。對鄧小平而言，高崗這種黑箱作業式的政治手法與作風，於公於私，皆不可長，更不能縱容。因為它既會顛覆黨內遊戲規則與政治生活規範，使得往後生存在其中將更為困難；高此一親疏有別、「以我劃界」的作法若得逞，鄧也難保與高關係淺薄的自身，在未來不會成為被高排擠、批鬥的對象。

第四、以鄧小平對於當時毛澤東希冀高層穩定團結之心理的判讀，他向黨中央與毛呈報高崗問題，也具有了一定的條件。

如前所述，鄧小平先後在全國財經會議與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充作毛澤東導引相關會議走向和緩、團結的助手，因此鄧可能在此歷程中愈加形成毛將黨內團結當作「重中之重」的認識；另外，鄧小平也在推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過程中，體認到毛澤東對於推行「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殷切與急迫，以及對黨內高層攜手與進的企望。高崗、饒漱石在政治上不知煞車，已漸引起毛澤東的嫌惡，鄧小平又具體掌握了高崗破壞黨之團結的把柄，向黨中央與毛告以高之惡狀的政治風險即便仍有，但已有值得一搏的勝算。

三、鄧小平揭發高崗的影響

鄧小平向黨中央舉發高崗舉止不軌對「高饒事件」發展的作用問題，根據鄧自己晚年所言，他與陳雲各自分別向毛澤東反映高崗問題後，從而「引起他（毛）的注意」。然而，這需要作更細密與深入的方析。

毛澤東對高崗、饒漱石出現戒心、甚至開始暗中釋放訊息、進行調查，

其時間恐還早於高崗遊說鄧小平的 1953 年 12 月 15 日。這從毛澤東與羅榮桓、陳毅的互動上可以得到佐證。

一、1953 年上半年，主持軍隊工作的彭德懷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中實行「一長制」，軍隊政工元老羅榮桓反對尤為激烈。羅不但當面向彭德懷陳述意見，他也希望彭預定提交該年 12 月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的報告中，有肯定軍中政治工作與制度的內容。為此，羅榮桓既同參與修改報告工作的高崗相談外，也求見毛澤東。毛澤東在與羅榮桓談話中，詢問羅對中央工作分作一、二線問題的看法，羅推薦高崗，毛以「高聽不得反對意見」提示羅（黃瑤（主編），2002: 760）。由於彭的報告是在 12 月 4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 190）。毛、羅相關會晤應是在此之前後。

二、1953 年 12 月 13 日晚上，毛澤東召集為參加軍隊高幹會而前來北京的陳毅談話。談話中，毛澤東詢問陳毅對於饒漱石所瞭解的情況，在陳如實告知其所知的饒的情況後，毛澤東將已掌握的高、饒兩人的問題告訴陳，提出警惕非法活動（劉樹發（主編），1997: 655；《陳毅傳》編寫組（編），2006: 273-274）。

從前二例所述，當鄧小平就高崗問題向毛澤東「告御狀」之時，毛已對「高饒問題」有所注意。鄧小平舉報高崗此舉的作用，實際上更在於促使毛澤東明快地對高、饒採取行動，進行組織處理。

鄧小平、陳雲是黨內首先主動向中共中央告發高崗從事不法活動的高級幹部。就毛澤東所知，鄧小平與高崗在歷史上素無嫌隙、冤仇，鄧沒有無故編織、坑害高崗的理由，鄧主動對其揭露高崗的本意，乃依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就事論事；另外，鄧小平不顧高崗在黨內的政治地位猶比他高的情況，毅然向黨中央揭發高的出格言行，如此顯現的是鄧對黨內紀律的堅持是甚於對黨內權位排序的顧忌。就毛澤東而言，鄧小平盡快而如實地向黨中央報告其關於高崗行為的所見所知，無疑是一嚴守黨內組織紀律的無可挑剔的表現。

毛澤東在事過境遷後的 1960 年代初期回顧此事時即評論：「從高饒問題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羅榮桓、鄧小平、陳雲。」（王力，2001: 317）毛澤東稱讚羅榮桓與陳雲，乃因羅為人正派，高崗根本不敢找他說人是非；陳雲

不徇私誼，不惜抖出高崗之劣跡。毛澤東稱許鄧小平正直，即因鄧尚法講紀，一見高崗踰規越矩，即上報送裁。

鄧小平對高崗的越級告發，其行為本身也另有一層毛澤東必須正視的政治含義與壓力。因為這不僅代表鄧小平是不認同、也不恥於高崗的相關行為，在政治上更實同是他誓與高崗分道揚鑣，不願再與高崗同心同伍、相安共事。易言之，鄧小平（以及陳雲）呈報毛澤東關於高崗的劣行，不單是他們對高崗的政治攤牌與決裂，其也直接限縮了毛澤東在處理行為脫序的高崗時的選擇餘地。

高崗本是毛澤東所一手提拔，他在中央握有重權乃毛所賦予，他在高層人際之間得以招搖，也是其以可「直達天聽」為號召。高崗行為出現偏差，毛最起碼得負識人不明之責。毛對高崗雖已有所不滿，但仍欲對之再予以察看，想不到高崗竟還私自遊說。被高遊說的鄧小平向毛澤東揭發，如同高「罪證確鑿」，無可抵賴。鄧小平基於黨的組織原則將高崗的行跡向毛澤東據實以告，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若對此置之不理，除使舉發者鄧小平陷入難堪，黨之綱紀日後將形同具文，毛的領導威信也會大加折損；毛若對高崗從輕發落，則顯示毛徇私不公，難以服人，揭發的鄧小平也不知該如何在中央繼續與高崗相處。因此，在鄧小平的告發下，毛澤東對高崗從嚴處置，乃勢在必行。如此可以彰顯毛澤東身為全黨之尊的高度，也可體現他對鄧小平、陳雲等人抵制高崗的意見從善如流的胸襟。事實上，毛也要進一步地探知高崗到底背著他「離經叛道」到什麼地步。

柒、鄧小平對「高饒問題」組織處理之參與

在鄧小平（一開始或透過周恩來）與陳雲報告毛澤東關於高崗的問題後，毛澤東頻仍地約集中共高幹就此進行談話，將「高饒問題」「揭了蓋子」。鄧小平除密集地參與由毛召集的限於小範圍人數的談話，其也肩負代表毛出面向個別的中共要人說明、疏通的任務。

從12月17日起一連三天，鄧小平皆前赴毛澤東住所參與對「高饒問題」的討論。18日夜，鄧小平和周恩來、陳雲、彭德懷前往毛澤東住所談話。19

日夜，鄧小平同陳雲前往毛澤東住所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 191）。如果說陳雲被毛澤東委託南下前去高崗前一年秋天休假行經的地區「消毒」（特別是挽回林彪），鄧小平的首要使命就是對中共若干高級將領進行思想澄清的工作。有資料指出：19日鄧小平同毛澤東談話後的當晚，就奉命去做彭德懷的工作（趙家梁、張曉霽，2008: 187）。如前所述，彭德懷與高崗來往密切，讓毛澤東與鄧小平覺得彭可能「誤上賊船」，因此有必要引導之「步上正途」。另外，約此前後，鄧小平亦曾前去看望羅榮桓（《羅榮桓傳》編寫組（編），2006: 330）。相關傳記僅著重鄧小平在這次探訪羅所流露出來的戰友情，特別是其注意到羅住家擁擠、狹小的狀況。然而，鄧此行亦甚有可能負有傳達高崗問題的重要政治任務。羅因一時受到高崗「蒙蔽」，居然在毛澤東詢問時舉薦由高出掌「一線」，也有需要加強溝通。鄧小平早在1930年代即與羅榮桓養成「無話不說」的個人情誼，因而適合擔負此一任務。

12月23日，毛澤東與高崗談話，對高崗進行批評。當天晚上，毛澤東召集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開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3: 281）。其討論的事項無疑是關乎高崗的問題。因為在隔日，亦即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在毛澤東請假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在講話中表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正式向高崗、饒漱石發出警告。

這段期間當毛澤東積極地與黨內高幹就高崗問題通氣、交換意見時，毛澤東事實上已將高崗問題定性。12月20日左右，毛澤東在召見羅瑞卿與譚政時就表示：高崗在「搞陰謀、組織地下司令部」，「他（高崗）不只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他也會打倒林彪」（《羅瑞卿傳》編寫組（編），2007: 180）。毛澤東在12月24日夜前往杭州後，留在北京的鄧小平與其他領導人，接下來就是要想辦法證成、坐實毛澤東對高崗與饒漱石的指控。

12月31日夜，鄧小平還會與高崗一同出席周恩來以總理名義招待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冶金工業部部長捷沃西安（Ivan F. Tevosian）等人的宴會（李烈（主編），1996: 540）。一週前毛澤東公開在黨內高層拋出「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8號車水馬龍」的問題後，高

崗此時應是如坐針氈、忐忑不安；背後揭發高崗的鄧小平，不知在宴會上是如何同向隅的高崗互動？對之是視若無睹、不屑以對，亦或是行禮如儀、談笑風生？

步入 1954 年後，中共中央對高、饒兩人的組織處理步步升級。於此過程中，在毛澤東的示意下，鄧小平多方面地參與，相當地活躍。1954 年初，高崗亟思與駐留杭州的毛澤東一晤以當面解釋，但其要求並沒有被毛與中共中央所接受。毛澤東在 1 月 22 日致電劉少奇：「他（高崗）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毛澤東，1990b: 440-441）1 月 25 日與 2 月 5 日，鄧小平就與劉少奇、周恩來一起找高崗談話。2 月 3 日，鄧小平也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在組織、籌備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也著力甚多。爲了說明查處「高饒問題」的進度或趕在全會召開之前統一黨內高幹對此問題的思想，繼其在 1953 年底所爲，鄧小平又就「高饒問題」分別探訪彭德懷與羅榮桓。1 月 24 日（或 25 日），鄧小平向彭德懷談高、饒活動（王焰（主編），1998: 566）。1 月底或 2 月初，鄧小平造訪羅榮桓，通知他中央許可其視自身身體狀況決定是否出席，或也告之行將在四中全會中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內容（黃瑤（主編），2002: 749-750）。2 月 6 日至 10 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題爲《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的發言。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爲了對「高饒事件」的案情作進一步的對證與挖掘，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則在 2 月 17 日至 23 日負責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鄧小平被委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原因，可能包括：首先、饒漱石在 1953 年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鬧事」的經過，鄧小平有所經歷並參與處理，可作爲一目睹饒犯錯的見證人；其次、根據鄧小平與饒漱石在黨內的相對地位，在 1945 年中共「七大」，鄧小平、饒漱石雖同樣選爲中央委員，但是在 1949 年組成的中共華東局中，鄧與饒分任第一、第二書記，鄧的地位在饒之上。由他領導對饒漱石的座談會，不會有坐鎮不住的情況；再次、爲了顯示饒漱石的錯誤是其來有自、需要從歷史根源上將之徹底揭露，參與座談會的人主要乃是陳毅等曾與饒在華東有過長期共事經驗者，由鄧小平主持座談會，感覺比較超然，多少可減免該會流於挾報個人私

怨的觀感。

針對饒漱石的座談會共舉行7次，前6次係對饒的「錯誤」展開核實與揭發，在第7次座談會上，鄧小平在饒漱石發言自我檢討後進行總結發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饒漱石與高崗勾結奪權的指控，特別是高、饒兩人「聯盟」能否成立的關鍵——饒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是否有意與東北代表張秀山配合「討安伐劉」的問題，饒漱石在檢討中強調：

據安子文同志最近對我說，張秀山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其內容多數是針對劉少奇同志，而以批評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現的。對於這一點，我在事先確無所知。反之，他發言中列舉若干具體事例批評安子文、薄一波兩同志，則恰與我的宗派主義情緒相投。加以他的發言中首先聲明，他的發言內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談過，故在他的發言稿印出之後，我未再行閱讀過（因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寫，不能多看，因此，這些東西拿到我秘書那裡我都沒有看）。反之，在當天張秀山及其他各大區發言之後，我還感覺這些發言有事實，有分析，有建議，不像財經會議上那樣亂套大帽子，因而感覺滿意，並認為這個會議比財經會議有進步……。所以我對張秀山的發言，始終未加批駁，客觀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張秀山來反對劉少奇同志，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極為痛心。

饒更進一步地堅稱，他與高崗之間絕無共謀倒劉的計謀：

在此次座談會上，有的同志以為我是全面的反對少奇同志；以為我是反安為名，反劉是實；以為我對待少奇同志的態度與高崗同志的反劉宗派活動必然有其密切聯繫；以為我為先鋒，高崗在幕後；甚至有個別同志以為我在這個問題存在有什麼重大政治野心。同志們對我的這種猜測，我現在無法申辯。我只有請求黨中央在這一點上據實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結論（張秀山，2007: 314）。

然而，據目前僅獲的鄧小平在座談會中講話的片段，對於前引的饒的辯誣之詞，鄧並不買賬，仍不假辭色地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楊尙昆，2001: 283）鄧更表示：「希望饒漱石本著四中全會的方針，抱著拋棄錯誤的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作徹底的交代，以便改正錯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9: 1159）鄧小平的此番言論如同為座談會的結果定調，因為後來鄧小平與陳毅、譚震林在3月1日聯名上呈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即指稱：饒漱石「善於偽裝，不易暴露他的這種本質，多年來以守法克己的偽裝，在黨內施展陰謀，爭奪權位，不到重要關節不伸手」；「在過去的長期工作中，一般是採用正常的方式來進行的，他的爭取權位的活動，是不到重要關節不伸手的。」同一報告也批評饒漱石：「尤其對於從財經會議到全國組織會議有關直接反對中央領導同志和參加高崗分裂黨的這個最主要的關節問題上，則企圖避重就輕，實行抵賴。這說明饒對自己錯誤所採取的態度，仍然是很不老實的」，「饒以後應向中央老實交代。」（鄧小平等，1985: 274-275）對於鄧小平領銜上呈的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報告內容，毛澤東悉數同意（毛澤東，1990c: 467）。可見他對鄧在饒漱石問題上的相關工作表現是滿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15日批准此一報告。

對高崗問題的繼續揭露方面，鄧小平也擔負督陣的要角。周恩來主持的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目前雖無資料說明鄧小平參與其中的情形，但從一些側面的資料可以得知，鄧小平所揭發的高崗找之遊說一同拱倒劉少奇的「罪行」，乃是高崗在座談會上受到反覆詰問的主要問題之一。

據時任高崗的秘書的說法：高崗在座談會上否認去過鄧小平家，強調他根本不知道鄧家在何處。高崗後來在家反省時也說，他從未去過鄧小平家，與鄧小平議論倒劉一事，僅有一次。也就是前文所提的1953年12月1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散會後（趙家梁、張曉霽，2008: 184）。由此亦可見，座談會上高崗甚有可能被指控：他曾特意登門造訪鄧小平的府上，專為勸說鄧一道倒劉。高崗對鄧小平遊說的具體情況，理應只有兩人知曉。座談會上高崗若遭受此一控訴，想必是鄧小平本人所親提而他人無法置喙。令人費疑的是，關於高、鄧1953年兩人會談真正實情的問題，到底是已是「虎落平陽」的高崗仍堅不吐實、抵死不認？亦或是另一種可能：高崗此時在政治上無異是隻可

任人妝弄的「死老虎」，在「牆倒眾人推」下，高崗被揭發的「錯誤」已是罄竹難書，鄧小平若稍將高崗找他遊說的細節添色三分，也於事無礙；鄧小平言過其實、誇大高崗的敵情，不正也可彰顯他此前向黨中央與毛澤東舉發高崗的正當性與必要性，進一步證成高崗的政治倒臺乃肇因其行為不檢，咎由自取。

高崗不諱言自身在政治上犯有嚴重錯誤，例如：中央雖明令禁止，但他仍繼續散播安子文所擬的政治局名單，藉此宣稱劉少奇及其人馬把持中央的人事任命權。在言行上，自己也多有輕佻不慎重的地方，譬如：說人長短、搬弄是非（主要是針對劉少奇）。但是高崗卻認為自己對劉採取的敵對態度與拆台行為，並非出於個人利害的考量；相反地，他自認這是對毛澤東對劉不滿之心意的領會、琢磨，以及結合現實的發揮。亦即他自命是領袖的鷹犬，在重新安置劉的黨內地位的敏感問題上，要盡心地以具體的行動為毛分憂解勞，為此一問題的順暢解決創造條件與輿論。然而，現在政治風向突變後，竟要他承認自己反劉以篡黨奪權，甚而反對毛澤東，實在是令他難以接受，感到含冤莫白（張秀山，2007: 313-314）。

高崗因毛澤東避不見他，有感「不才明主棄」；在針對他的座談會上，昔日同志又對之疾言厲色，興嘆「多病故人疏」。2月17日，座談會進行到第三天，高崗就試圖自殺而未遂。高崗嘗試自殺的舉動，又被看作是有意抗拒、甚至是以死要脅黨，錯上加錯之下，高崗的問題性質又因此而加重。為了進一步地處理高崗問題，中共中央成立專案組，由鄧小平出任組長。鄧小平對於軟禁在家反省的高崗對其自身錯誤問題的認識程度以及指控罪名的招認情形，頗感不耐，說高崗交代問題「像擠牛奶」（趙家梁、張曉霽，2008: 27）。此話經由習仲勳傳到高崗耳裏，讓本已自覺有冤、心緒低迷的高崗，愈感不知所從，更加懷疑自己根本無法度此關卡。

鄧小平在高崗被送交組織處理後，在揭露高崗問題上顯得冷酷。鄧如此盡職的表現，最主要是眼見毛澤東對高崗的離棄。另外，由於鄧小平是高崗問題的關鍵揭發者，高崗被狠受批判與打擊同鄧告狀直接相關。高崗將來若能捲土重來、東山再起，鄧小平恐有受之報復之虞。鄧小平是否有「宜將剩勇追窮寇」一股作氣將高崗徹底打倒以免絕此後患的私人考慮，則是一見仁

見智的問題了。

因為苦得不到毛澤東的特殊關照，再加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昔日同僚對之一再的逼問施壓，高崗就忿忿不平地指稱：「這些人都準備好了，一致對我的。」（李肅，2007）8月17日，高崗二度自殺並身亡。高崗雖死，但是追伐「高饒問題」並將之公審的工作並未就此歇手。

1954年底鄧小平負責同周恩來、陳雲、胡喬木等研究起草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報告。相關文件即是後來提交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值得一提的是，此一報告原定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人是周恩來。然而，周在會議即將召開之際因急性闌尾炎開刀住院，鄧小平臨危授命在1955年3月21日擔負報告的任務。這一安排也頗符情理，因為鄧小平對高崗問題的告發，讓處理「高饒問題」一躍成為中共中央首當處理的要務，之後開啓的對「高饒問題」作組織調查與處理的階段，鄧小平又幾乎無役不與。由他代表黨對此問題作出結論、劃上句點，確實也不失名正言順。

在高崗倒臺後，對於若干高崗涉及的歷史案件要求重審的申訴，鄧小平經手處理而不得閒。1962年，小說《劉志丹》再次引發對西北革命歷史的爭論，因事涉對高崗的歷史影響的處理，鄧也積極過問（李原，2003: 3-4, 171-183）。

捌、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的政治獲益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上最重要的政治得益，就是更進一步地獲得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

毛澤東原希望藉由重用高崗來對劉少奇與周恩來的權力進行箝制或加以壓抑。但是高崗在權力面前忘乎所以，行動上又過於莽撞、冒失，不但讓毛澤東失望，甚至讓之險難以收場（其缺席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此舉本身，就反映出毛當時在政治上頗為難堪的處境）（林蘊暉，2008: 139-148）。在高崗的問題被揭發、處置後，毛澤東自然無法再繼續期望透過高崗對劉、周施以權力平衡，毛需要一政治人物為其所信任、本身又能堪大任，在相對於劉、

周享有重權之時，可秉公理事而不會圖謀私利。相權之下，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不二人選。

如前所述，鄧小平向黨中央與毛澤東陳告高崗密謀的活動，是毛澤東決定嚴肅處理高饒的關鍵原因與轉捩點。「高饒問題」被置於政治檯面後，可以發現：毛澤東有意讓已因告發高崗而立功的鄧小平，繼續有擴大表現的機會，也就是要鄧小平在處理「高饒問題」上扮演重要的執行角色。與此同時，毛澤東既要鄧小平接掌「中箭下馬」的饒漱石原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之職外，更任命鄧小平出任黨中央秘書長。此一職位及其領導的中央秘書處，即是兩年後中共「八大」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的前身。對此，陳伯達晚年曾評論：「中央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實際就是總書記，只是那時還沒有用這個名稱。鄧小平同志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陳曉農（編纂），2005: 121-122）實際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鄧小平得到的是高崗生前竭力追求而仍未得的政治地位。

深諳權力政治的毛澤東，也希望其對鄧小平的新人事安排，可有助其撫平高崗鼓吹的「軍黨論」在軍中所激起的議論情緒，特別是「老子打天下，卻沒坐天下」的心理反彈。進一步地起用在國共內戰中立有彪炳戰功的鄧小平，可以稍平復軍中不滿的心理（可能基於同樣的考量，與此同時，林彪與鄧小平一起在1955年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在1954年新改組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中，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其之委員。除了軍委主席毛澤東，鄧小平乃為唯一不具軍職身分的軍委委員，毛澤東希望鄧小平協助他貫徹「以黨領軍」的原則。

對於鄧小平反對高崗、饒漱石，實質上支持劉少奇的舉措，劉少奇應是有所感激。這有效化解劉當時所承受的政治圍攻下的壓力，並助其保住「二把手」的政治地位。因為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高崗找他一同倒劉的行徑，就使毛不能再對高崗倒劉的活動裝作推諉不知；鄧的相關舉措將情勢白熱化後，毛若在此時更動劉少奇的地位，也就有如認可高崗的派系爭鬥的作法與訴求，這將大傷毛澤東作為黨的大家長與守衛者的宏大形象（MacFarquhar, 1997: 640）。

對於鄧小平的「義舉」，劉少奇也確實銘記在心。劉少奇在「文革」中被

批判時，當「造反派」又重提十餘年前高崗曾大做文章的「天津講話」為難他時，劉少奇猶表示鄧小平是肯定相關講話的（劉振德，2003: 355）。劉的遺孀王光美晚年時亦對鄧小平在相關事件中的表現甚為激賞並評論：「你要問我劉鄧共事有什麼特點，我覺得『高饒事件』對他們是個考驗，七千人大會是一個，後來就是『文化大革命』。」（王光美，2004: 156）由此可見，從劉家人看來，高饒一事在鄧、劉關係發展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劉少奇對鄧小平的政治回報，就是支持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扮演愈益吃重的角色與地位，即便這會對劉自身產生分權的效果。鄧小平在黨內地位的迭次拔擢，當然主要取決於毛澤東個人的意念，而且毛澤東短時之內迅速提拔鄧小平，也含有以之箝制劉少奇、周恩來的用意。劉少奇雖不能改變毛主席的此一人事佈局，但由在高饒政治風波中表現正直、並支持自己的鄧小平出任黨內要職，可令劉較易接受並放心。因此，劉少奇對於鄧小平之後政治地位的不斷上升（主要表現在中共「八大」後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員與中央總書記），多予以正面的肯定，甚至「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點責任」（王力，2001: 1069）。綜上所述，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挺劉少奇的決定與表現，既消弭劉對地位竄升的鄧的懷疑，也奠定了鄧、劉兩人在其後中共政治中合作的重要基礎。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的表現，除了贏得劉少奇的信任，也獲得與劉關係相近、在中央任職的政治人物的認可與支持。這些屬於劉少奇舊部的政治群體，從「高饒事件」中既欣賞鄧小平對他們「老長官」劉少奇的支援，也多少直接受益於鄧在相關過程中就事論事的不阿表現。鄧小平在1953年先後替被高崗批判的薄一波、被饒漱石盯上的安子文緩頰、說「公道話」，無疑讓後者對之有所感戴，並在後續的工作中真心予以配合與協助。至於常被外界視作劉的另一「大將」彭真，也因「高饒事件」的處理，解決了其於國共內戰初期在東北的主要政敵高崗。鄧小平在相關事件中起到的推進作用，彭真自是明瞭。這或讓彭真較能接受鄧小平在黨內地位相對於之「後來居上」的事實，最起碼是較不予以排斥。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的正直、果敢形象，甚至也在與高崗問題有所瓜葛的高幹中得到正面的反響。例如：與鄧小平在歷史上素無淵源、關係的

陶鑄，對鄧小平在處理高饒一案的表現，甚感佩服，公然表示願意以鄧小平為師（曾志，1999: 452）。

此外，鄧小平自身也以「高饒事件」為戒，公私有別、不講關係，在公餘憩閑來往中，也注意份際，並在工作上要求其下屬不要聽「小話」。這更進一步地有助樹立鄧小平在中共高幹中的威信。

玖、結論

此節首先將對鄧小平晚年何以堅持「高饒事件」原判的原因，作一扼要的整理。留意鄧晚年對相關歷史解釋權的緊控，可對其對該事件的角色與作用，有一更完整的認識。其次，則針對本文研究如何增進對鄧小平政治人格特質的理解，加以簡要的討論。

一、鄧小平堅持「高饒事件」原判之政治考量

毛澤東撒手人寰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時代結束後，中共黨內逐漸開始對毛當政時期的政治與歷史進行反思與重議，其中不免也包括「高饒事件」。高崗當年的活動中，確有許多違背黨組織紀律與原則的問題，其造成的黨內高層思想混亂、心理波動，高崗也實有不可旁貸的責任。但在估判高崗的行事動機時，是否就可將之無限上綱地說成要奪權自享、甚而竊據黨國最高權位？至於曾在背地鼓舞、教唆高崗的人，又當負何種法律與政治責任？高崗與饒漱石當年被控以私組政治攻守聯盟，合謀瓜分權力大餅。對他們及其「黨羽」所作的相關指控，其立論主要是賴於較客觀、確切的物證，還是基於若干大人物所做的心證（林蘊暉，2009: 344-345）？要求對「高饒事件」重新予以審議者，主要是高崗的遺孀，以及因高崗問題而在政治上遭到株連懲處的原東北局的高幹，尤其是所謂支持高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的「五虎上將」（他們的「入罪」，顯然也與鄧小平密切相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9: 1163-1165, 1168）。

然而，作為毛後時期中共政治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雖然不再將「高饒問題」看作是「路線鬥爭」，但仍以明白的語言與堅決的態度維持對該問題的

主要原判。他表示「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鄧小平何以強硬地主張維持對「高饒事件」的原有判決？

首先、就鄧小平自身對此案的認識與認知，相關「主犯」行徑不但可議、更爲律法所不許。鄧最撻伐高崗的就是其「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鄧小平，1983: 257-258）。與此點相關的是，就現實的考量，鄧小平必也斷不容許在其治下，政治人物如同高崗當年般不按組織原則來往、從事密室交易、爭權奪利。另外，高崗爲人詬病的還有嚴重的私生活問題，鄧自不願高崗那種敗壞的生活作風重新再現。否定高崗，兼有批判相關不良傾向的教育意義。

其次、鄧小平在重新回顧「高饒事件」時，也注意到相關事件的重議，可能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產生不良的影響。1980年代初，當外界正在猜疑中共是否可能會全盤否定毛澤東時，鄧在處理相關問題上尤須謹慎以對。因爲將「高饒事件」予以重審，免不得要觸及毛澤東在此事過程中的角色以至責任問題。如前所述地，鄧小平對此就不諱言「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按照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所設定的評論毛澤東功過的標準說法：毛的領導在1956年以前皆屬正確，其後來所犯之錯誤的性質，亦爲偉大人物步入晚年後思考偏失所致，而非政客慣用權術所肇禍。然而，「高饒事件」發生於時屬毛「英明領導」階段的1956年之前；該事之源起，又與毛澤東在中共高層內試以分而治之、後來卻幾近失控有關係。毛在此案中的相關責任若公諸於世，不就等同表明官方評毛的說法標準有所瑕疵？爲保護毛澤東已受損的威信與形象，鄧小平在其親自審定、並視作自身「政治交代」的《文選》中，刻意刪去他對毛在「高饒事件」中的責任的評斷。鄧小平公開還是堅持高崗要獨攬全責，並不准此案重議。同是爲尊者諱，《文選》中也不提鄧小平所言高崗獲彭德懷支持的字句，因爲鄧想保存的是彭在中共黨史上梗直、正派的偉岸形象。

二、「高饒事件」案例對增進鄧小平政治人格特質理解之意義

無論是在「高饒事件」事發的過程、問題的處理以至於歷史的回顧，鄧小平皆深度參與並扮演要角。鄧在該起政治鬥爭與事件中的態度與作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反映出鄧小平的政治人格特質，特別是增進對鄧的政治稟性、器量、風格及行為的認識與瞭解。²

首先，鄧小平能機敏掌握上者心意與動向，並機警調整態度以對。

在「高饒事件」發展過程中，鄧小平尤為關心毛澤東對整個政局的意向，以及他對若干重要政治人物態度之微妙變化，並將之作為自身行動的主要考量。在1953年深秋以前，當毛澤東重用高崗，並利用高與饒漱石以對劉少奇的工作及其主要助手加以施壓時，鄧小平只有在毛有所示意之下，方才對高、饒過分積極的政治活動進行冷卻、限制的動作，至於高、饒本人，鄧還不敢造次行事。鄧直至毛開始對高的一些行為心起疑竇，才敢將高的脫序行徑加以彙整呈報，促使毛從嚴處理高、饒。鄧在奉命揭發、調查高、饒問題以後，或為化解毛在高崗囂張活動的背後可能有所涉入的尷尬，鄧力要高、饒承認共謀犯上奪權的反黨性質錯誤，並從歷史與人事關係上「深挖」高、饒犯錯的根源與嚴重程度，以證兩人本非善類、自我作孽，從而間接地將毛從用人不當、幕後操弄的政治責任中加以開脫。毛在此政治事件後不吝對鄧提拔，恐也與鄧在處理高、饒問題時悉心為毛洗刷干係有關。

其次，鄧小平擅於緊抓問題要害，更敢於果斷速決、冒險行動。

在「高饒事件」中，鄧小平對於高崗的政治態度有一變化的過程：從高得毛厚愛、鄧莫敢小覷，到高舉止異常、鄧審慎觀察，再到高前來遊說、鄧據此揭發。對鄧而言，認為高的問題茲事體大、進而下定決心向黨中央揭露高，無疑是一步政治險棋。因為在1953年多數的時間裡，毛對高表現得甚為信任，高也以能「通天」在高層間自我標榜。鄧無法百分之百地確認毛與高之間關係緊密的程度，可否容得第三者對毛指陳高的是非問題（除非鄧與毛

2 作者感謝審查人所提的：在此一個別歷史案例中，「編織進作者對鄧人格特質的理解」的建議。

之間對高的問題存有一密會與溝通)，鄧至多只可在師出有名、又可能擊中高的政治「死穴」的情況下，方會對高出手，不然既可能惹毛不快、更恐遭高挾怨報復。1953年12月1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散會後，高延續會上的討論在離場途中再與鄧商議，此事本是可大可小（中央作出正式決議之前，交換意見並非全然不可），鄧卻巧妙地將之作爲突破口，整個事態也因而急轉直下。

鄧此前雖或有所耳聞與覺察高的異狀，但可能因高未到明目張膽的嚴重程度，尚不構成政治上「觸犯天條」的大忌，抑或是關於高的問題僅止於耳語流言，若要對之追究也一時苦無實據，因此鄧只能審時度勢、以靜制動。但經此回高崗與其所做的短暫晤談，鄧認定高此舉是動機不良（扳倒副統領，意在取而代之）、方法不對（私下串連，從事權力交易）的集中表現。在毛對高已心生疑惑之際，鄧儼然以親歷高犯錯的人證身份狀告黨中央，使結果激化發展，讓高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再次，鄧小平對於自身的政治對立面，重手處理而不手軟。

在「高饒事件」中，高崗因鄧小平對其的告發而身陷政治火海，饒漱石也因被看作是高的「同盟軍」而成爲事故的「從犯」，鄧也負責揭發與調查兩人的政治錯誤。鄧既在政治上與高、饒決裂並處於對立的局面，索性對兩人施以徹底的政治清算，也就是「一旦開罪，即得罪到底」，就算對他們的批鬥可能過於上綱上線，相關指控比照事實可能流於不成比例。鄧小平如此行之，雖不排除有嫉惡如仇、矯枉過正的心理，更有其他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可協助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完成離棄高、饒所需的程序問題；另一方面，或也爲避免高、饒日後可能對鄧本人的反撲與尋仇。

最後，鄧小平對於自己深度涉入的政治與歷史爭議，有不完全正視己責、甚而避重就輕的傾向。

在「高饒事件」中，鄧小平因舉發高崗、調查高與饒漱石而立功，既獲致不少的政治資本，地位也大幅進揚。鄧在晚年自認在此事上行事無愧、擇善固執，不允許「高饒事件」重議；其對「高饒事件」的經選擇、剪裁過的講話，更成爲中共官方迄今爲止對相關政治事件的標準說詞。它有力地一統黨內、外的思想，也強制地規限了對相關議題的深度思考與自由討論。即便如此，要求「高饒事件」重議之聲，並不因此而全然消聲匿跡，受此案牽連

的相關人士及其家屬，仍不氣餒地上書陳情或想方設法地呼籲發聲。其中自也不乏對當年該事主要經手人與處理者鄧小平提出質疑。例如：懷疑他在向黨中央與毛澤東密告高崗問題時是否小題大作(趙家梁、張曉霽,2008: 184)？他在奉命處理「高饒問題」時，是否對高、饒逼供取證(李肅,2007)？他所言的「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張秀山,2007: 376)？這些問題在鄧對「高饒事件」的歷史一錘定音時皆沒有談及或予以足夠的說明。

事實上，如上所述的鄧的四種政治人格特質，在之後中共重大事件和問題上，也一而再地展現，並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199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陳雲年譜》，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

2007 《葉劍英年譜(1897-198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毛澤東

1977a <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80。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b <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90-97。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c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38-156。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a <關於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請鄧小平多管一些的批語>，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頁72-7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b <關於高崗來信和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問題給劉少奇的電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頁440-44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c <在鄧小平等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上的批語>，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 (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頁4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王 力
200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
- 王光美
2004 〈王光美談鄧小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頁153-15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王 焰（主編）
1998 《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吳群敬
1997 〈在西花廳周總理身邊工作〉，《中共黨史資料》63: 100。
- 李 原
2003 《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李 烈（主編）
1996 《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雪峰
1998 〈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冊，頁202-22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李 肅
2007 〈1949 之後：高崗遺孀喊冤〉。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 年 12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7-12/w2007-12-28-voa61.cfm>
- 林蘊暉
2008 《國史劄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09 《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第十二兵團（編）
1967 《鄧小平反革命罪惡史》。北京：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第十二兵團。
- 孫 岳
1998 〈我給周總理當機要秘書〉，見李琦（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頁154-1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張秀山
2007 《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 張明遠
2004 《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 張培森（整理）
2009 〈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3: 29-36。
- 陳野蘋、韓勁草
1985 《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陳毅傳》編寫組（編）
2006 《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 陳曉農（編纂）
2005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曾 志

1999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彭德懷傳》編寫組（編）

2006 《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黃 瑤（主編）

2002 《羅榮桓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楊尙昆

2001 〈回憶高饒事件〉，見楊尙昆（編），《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 281-3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趙家梁、張曉霽

2008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

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

2002 〈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百年潮》3: 76-80。

劉振德

2003 《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劉樹發（主編）

1997 《陳毅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鄧小平

1983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見鄧小平（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頁 255-274。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20 冊，頁 512-525。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鄧小平、陳毅、譚震林

1985 〈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20 冊，頁 272-276。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薄一波

1997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羅榮桓傳》編寫組（編）

2006 《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羅瑞卿傳》編寫組（編）

2007 《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B. 英文部分

Huang, Jing

2000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eiwes, Frederick C.

1990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 E. Sharpe.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ao Gang-Rao Shushi Incident

Yen-lin Chung

Postdoctoral Fellow a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Gao Gang-Rao Shushi Incident was the first political purge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ng Xiaoping, then a vice-premier,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is political struggle. Regarding the role and activities of Deng in this political affair,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dealt with the issue according to Deng's related statement which actually had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and was an incomplete account of the incident. Western publications have long noted Deng's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purge. However, given the limitations of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empirical study related to the issue.

Based on newly available materials and recent interview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his political initiative, 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Mao Zhedong, on the one hand,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urged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Chairman Gao Gang and Minister of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CCP Rao Shushi to heavily pressure other leaders, especially Liu Shaoqui and his following, into accepting Mao's related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Mao asked Deng to play a role which was to ease the political tension and confrontation caused by Gao and Rao, and promote party unity and consolidation. During the above political process, Deng himself gradually believed and formed the perception that Mao cared about party unity and stability more than other political goals.

When Mao was already disappointed with some of Gao's impetuous political behaviors and started to doubt Gao's loyalty to him, Deng acted

as the crucial informer letting Mao know of Gao's secret lobbying efforts aimed at changing Liu's political status as Mao's successor. In order to show his dispassionate fairness and prevent divulgence of his own deep involvement in some of Gao's secret political plots against Liu, Mao, who might have had a much close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ao and more sympathy for Gao's political views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had no choice but to decide to rapidly handle and punish Gao's illegal acts and activities.

Mao delegated Deng and other leaders to investigate the so-called "anti-party activities" of Gao and Rao, and harshly conduct a struggle against these two political figures who had lost the grace of the Supreme Leader. Deng strove to please Mao and meet his expectations. Unsurprisingly, Deng finally replaced Gao as Mao's favorite and consequently was the largest beneficiary of the political incident.

This study also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s of Deng's special political behavior and attitudes which repeatedly appeared in the rest of Deng's political life and had much influence on Chinese politic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Gao Gang-Rao Shushi incident, Mao Zedong, Chinese elite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